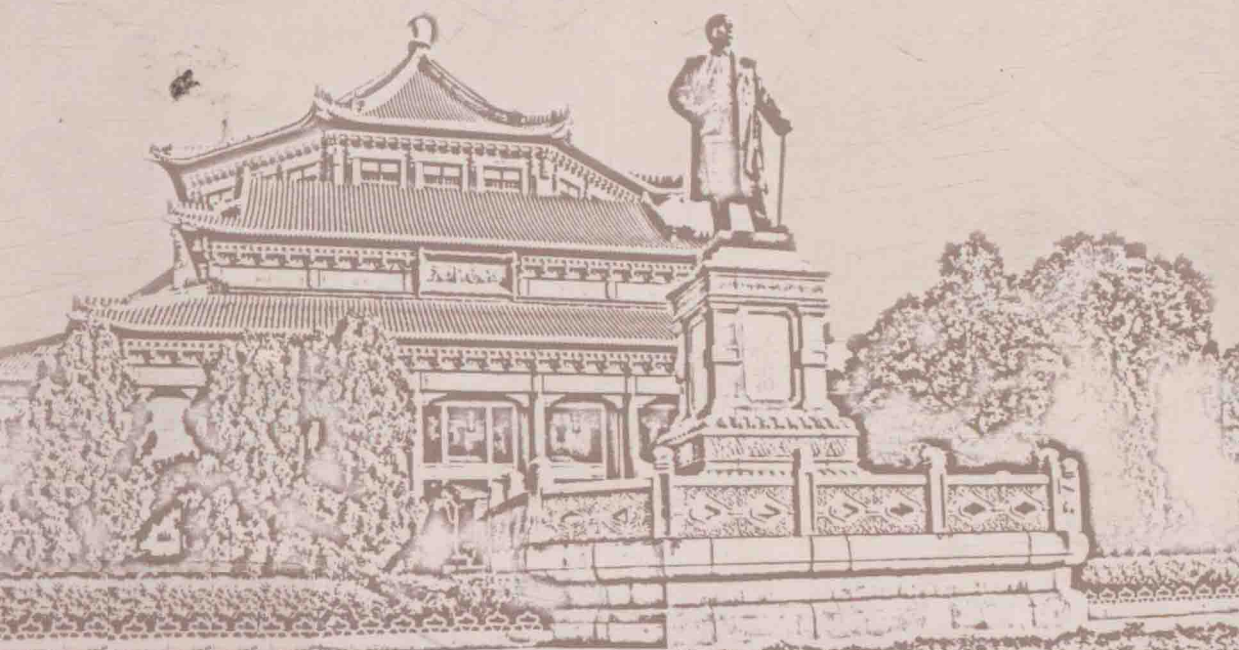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华侨华人与 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冷东 赵锐 庞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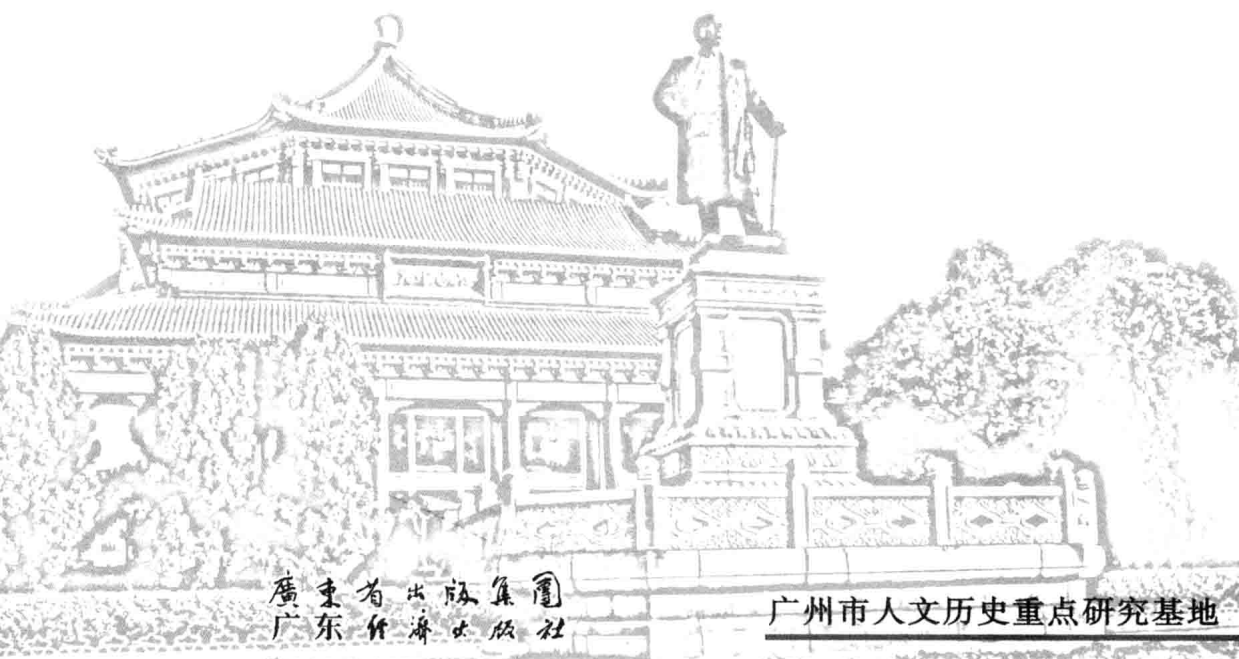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市人文历史重点研究基地



民国时期华侨华人与 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冷东 赵锴 庞洁◎著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市人文历史重点研究基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华侨华人与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 冷东, 赵锟, 庞洁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454-0604-7

I. ①民… II. ①冷… ②赵… ③庞… III. ①华侨—作用—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广州市—20世纪②华侨—作用—社会发展—研究—广州市—20世纪③华人—作用—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广州市—20世纪④华人—作用—社会发展—研究—广州市—20世纪 IV. ①D 634.3②F 127.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9194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12楼)
经销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 海南工商贸易区A幢)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84 000字
版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7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454-0604-7
定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一直是广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的重点，在此范围内，选择华侨华人与广州城市近代化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广州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典型性。广州是全国范围内较早迈开近代化步伐的城市之一，从中既能够窥视出近代以来沿海、沿江一带开放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也可以集中体现广州这座历史名城的特殊地位。第二，近代是广州城市近代化建设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广州的城市近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成绩斐然，整个城市的结构、功能、社会状况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以后乃至当今广州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三，尚没有把华侨华人对广州城市近代化的贡献作为个案来进行的专题研究，这就无法从整体上再现广州城市近代化这一高潮时期的历史面貌。因此自2005年以来，笔者便组织研究生从事这一研究领域的工作，经过4年的研究，完成了这部书稿。本课题得到广州市人文历史基地的大力支持，立为基地的重点项目，并得到大力资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稿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具体分工如下：绪论主要由程慧负责，赵锟负责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庞洁负责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李高霞负责第九章，曾繁花负责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邮电业的影响部分的撰写，杨敏艳负责民国时期广州电影业部分的撰写，笔者担任其余部分及全书的定稿。

书稿虽然完成，但是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教，共同推动广州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

绪 论

城市近代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兴起以来备受学术界的关注，道理很简单，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正在致力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而城市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集中体现和主要载体，因此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无疑应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这个建设怎么搞，中国已经走过的城市现代化道路怎么样，有什么经验、教训，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知识的配合，吸收多方面的智慧，当然也包括历史方面。

一般认为，城市史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并产生了城市社会学。^①民国时期，我国就有一批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如史识通博的梁启超也曾有过都会历史的专论，但严格地说，并没有城市史的学科专著问世。城市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而近代城市史研究则较晚，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重庆、天津、武汉四个不同区域有代表性的重点城市列为国家课题，分别由四地的近代史学者承担，先后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②、《近代重庆城市史》^③、《近代武汉城市史》^④、《近代天津城市史》^⑤等。这四部著作分别是对近代四个通商口岸城市进行的个案专题研究，篇幅宏大，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具有开创意义，是迄今为止我国近代城市个案专题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近代城市史产生兴趣，并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出版了一大批个案城市研究的论著，如

① 罗澍伟：《中国城市史研究述要》，《城市史研究》1988年第一辑。

②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 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 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南通现代化》、《鞍山城市史》、《开封城市史》、《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等，使近代城市研究很快成为了学界瞩目的研究领域。“八五”期间，规划小组又将区域城市研究列为重点项目，开展对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城市群的研究，从而将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从个案研究的层次提升到了区域研究的层次。如《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①即以城市近代化的历程为线索对上海、宁波、福州、广州、厦门等城市的市政、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领域的变迁与发展作了多层面的剖析，阐明了通商口岸与各自腹地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个性与共性。此外，还有《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等著作，这些都堪称区域城市研究的经典之作。除了上述有关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论著，每年还有上百篇涉及近代城市研究的论文发表，专门性的杂志《城市史研究》也应运而生。这些都表明，近代城市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也越来越细化和扩大化了。

与前述研究相比而言，本论题的前期研究则明显较为薄弱，这与广州在中国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就笔者目前所见，尚没有以广州城市近代化为主题的专著问世，《广州简史》^②是系统研究广州历史的第一部著作，但它仍按照传统通史的写作体例，以革命战争和政治人物为主线，而对广州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方面，如市制的沿革、经济的转型、文化机制的衍生、社会生活的变迁等鲜有涉及。《广州史话》^③收录了71篇短文，文笔优美生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犹如一幅幅形象生动的历史画卷，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此书是一本了解广州的良好读物。《广州历史地理》^④与《广州城市发展史》^⑤是笔者所能见到的两部关于广州城市发展的专著，但前者主要在历史、地理方面着力颇多，后者则在前者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广州的历史人文地理，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地考察了从古至今广州的建制沿革、人口、交通、手工业、外贸业和旅游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及其演变过程，这就很难把握广州城市近代化的过程，其史料

① 张仲礼：《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杨万秀、钟卓安：《广州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 杨万秀：《广州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价值大于研究价值。此外,还有诸如《广州的历史、今天、明天》、《广州城市发展与建设》等著作,均把广州近代城市的发展作为背景资料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在区域城市研究中,仅《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一书对广州城市近代化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该书第五章对广州城市近代化作个案专题研究,以广州开埠为契入点,对近代广州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地位的变迁、经济结构的转型、城市政制与文化衍生的轨迹、城市建设的巨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不同的写作视角。但一部整个东南沿海区域城市研究的论著,对广州城市近代化的论述很难尽其详。

论文方面,有关广州城市近代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把其放置于一个大背景中,如以广东城市近代化为研究主题的《陈济棠与广东的近代化建设》、《辛亥革命后广东近代城市的发展(1911—1936)》、《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与动因研究——以镇集高度发达的广东为例》;一类是侧重于其过程的某一方面,如以广州城市近代化建设的某一方面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孙科与20年代初的广州市政革新》、《广州城市规划历史研究》、《20世纪前期广州城市经济的转型与发展》、《西势东渐与民初广州城市风貌的变迁》。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赵春晨教授于2004年2月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的《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近代化略论》,此文对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以及其成就与不足之处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例。

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化的称谓并不统一。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把近代化和现代化统称为现代化,不使用近代化一词。二是把近代化称作社会转型。三是将近代化这一概念同历史分期紧扣,并区分中国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为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①笔者赞同第三种情况,即认为使用近代化这一概念比较贴切。那么,何谓城市近代化呢?

所谓城市近代化,是指某一城市处于由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变的过程,侧重点是城市的质变,城市本身在这种变迁过程中得到了更新和改造。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②:

① 宋晓来:《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述评》,《中州学刊》,1998年第2期。

② 乐正:《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1) 城市功能与作用的近代化：首先，城市经济是城市产生发展的基础，是制约城市结构功能变化的主要因素。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市场成为竞技场，因此，临近市场、交通发达的城市成为必然的经济中心，除流通和消费功能外，生产功能得到极大的强化。生产、流通消费的一体化、系统化使城市经济不断扩充完善。经济功能成为决定近代城市命运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其次，与城市经济资本主义化相适应的，是城市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化、近代化。市政厅、市民委员会和独立的司法机关三者构成管理城市的权力机构，政党社团、社会舆论与集会示威形成市民参与、监督城市政治生活的新格局，直接选举、民意调查、街头政治成为市民表达政治的基本手段。再次，近代城市的文化功能逐渐向科学化、商业化、市民化方向靠近，全社会都意识到普及知识的必要性。新型的教育文化设施大量增加，各种报刊、书籍纷纷出版，少数人的文化正在变成多数人的文化。

(2) 城市建设的近代化：城市功能的多样化、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变了人们对城市建设的基本构思和要求。城市建设的规划受到理性精神、商业精神和生产力水平的支配，城市的经济功能得以突出。在近代的城市规划中，过去以政府广场、祭祀宗庙为中心的城市布局，改为以商业街区为核心。同时，近代生产力水平的高速发展给城市带来福音：照明设施的便捷、汽车的出现、道路的拓宽、电报电话的普及等。总之，近代市政工程革命与建筑革命，使城市的外形景观改变了，内在生活质量也变了。

(3) 城市社会结构功能的近代化：伴随着城市功能与作用的近代化，其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人口结构中工商业人口比重增加：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人数日增，越来越崭露头角，从事各种新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女性也开始走出家门进入了从业者的行列，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甚至进入政府部门，成为城市的管理者；社会组织中业缘关系逐步取代血缘、地缘关系，商会代替传统的行会、帮会组织主持事务；社会流动增加，社会价值观念转变。经过长期的磨合，近代城市的社会体系在结构功能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华侨华人的研究。广东省北枕五岭，南濒大海，海陆兼具，是中国的南大门，也是中国联系港、澳、台和欧亚大陆与西太平洋之间

联系的重要纽带，成为中国历史上海外交往发生最早、外贸最为发展的省区，中国华侨华人最多的省份。广东省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华侨众多，遍布天下，这成为广东省的突出特点。根据有关资料，海外华侨华人有 3000 万人左右，遍布世界各国。^① 国内也有归侨 100 万人、侨眷 2000 多万人。而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约占华侨华人总数的 2/3，即 2000 万人左右；归侨和侨眷也主要集中在广东。^② 如果从区域和语系的角度，海外华侨华人绝大部分来自广东、福建，其次是广西、云南，很少部分来自江浙、两湖、山东、东北等省。早期海外华侨华人的方言群主要有福州、漳州、泉州、潮州、海南、客家、广府、兴化、雷州等，而广东省即占有广府、潮州、海南、客家四种，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主体。

广东海外华侨华人在对侨居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亦在祖国和家乡近现代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有关广东华侨的研究，既是中华民族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有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更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早在 20 世纪的初期，就有了对广东华侨史的研究，梁启超、孟森、胡绍南、李长傅、姚楠、温雄飞、刘继宣、束世舆、罗香林诸先生的研究成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广东华侨史的内容，可谓广东华侨史研究的开端。建国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广东华侨史的研究迎来了真正的高潮。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学术交流活动频繁开展，学术研究成果喜人，广东每个侨乡都办有发行五大洲的侨刊，这在沟通乡上情谊，激励归属意识、亲和意识，振兴中华人，增强民族凝聚力上，起着不可估量的持久而强劲的作用。

虽然广东华侨史研究有了可喜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由于广东华侨史研究的空跨度甚大，有关研究处在分割的状态，如 1989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祖国的广东》丛书中之《广东社会科学四十年》，按学科大类及各自相对独立的专题，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全省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其中华侨华人问题，被分割成“华侨问题”、“东南亚华侨华人史”、“华侨教育”和“海外华文文学”。到目前为止，尚无一本有关广东华侨史的著

① 方雄普、谢成佳：《华侨华人概况》，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第 391—393 页。

②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作（不包括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在所有的研究中，还没有集中探讨华侨华人与广东经济政治中心广州的论著，这是与广东省的地位和特点不相称的。因此，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填补这一空白，就成为本书的目的。

众所周知，广东在历史上是著名的侨乡，广东华侨遍布世界各地。据民国时期侨务委员会统计，全球华侨人数共有800多万人，其中粤侨约占600万人，约为全数的70%。这些华侨绝大多数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猪仔贸易”掠卖到世界各地的华工，或是为生活、政治形势所迫赴海外谋生存者及其后裔。他们背井离乡，饱受磨难，在海外艰苦创业，同时热爱家乡，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尤其对于省会广州的发展甚为关注。至20世纪上半叶，华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时逢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而此时的广州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城市建设，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且对华侨资本采取扶植、保护政策，从而激发了海外华侨的投资热情。据调查，华侨在1919—1937年间，投资广州企业的户数为7720户、投资数额为118622496元，占近代华侨投资广州企业总户数9125户的84.6%、投资总额145139754的81.73%。由此可见，20世纪上半叶是华侨投资广州的高峰时期，既是华侨在广州投资户数最多的时期，也是近代华侨在广州投资金额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华侨在广州投资行业分布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投资行业包括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等各个行业，从而直接推动了广州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壮大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华侨在海外深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先进科学技术思想的影响，掌握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文化科学知识，在经营的过程中纷纷采用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科学技术，对推进广州地区工业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吸收侨汇上看，1933年为2.5亿多元，1934年为1.85亿多元，1935年为2.68亿元，1936年又增加五六千万元，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这些侨汇不仅直接弥补了广州的贸易入超，而且直接为广州城市近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观的资金。此外，广大海外华侨深切认识到人才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兴办新式教育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广州不少新式学校的开办，曾得力于华侨的支持，包括民国时期的私立广东国民大学、私立广州大学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广州城市的近代化。

虽然华侨对广州 20 世纪上半叶的城市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有关研究取得可喜成绩，例如林金枝《论近代华侨在广州的投资》（1862—1949）、《侨史学报》1987 年 1 期。但尚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是人物传记较多，缺乏系统化与理论研究，局限于按语系和部分国别华侨史的研究，尚无广东省的中心广州市海外移民与城市现代化研究的学术著作。填补这一空白，对华侨与广州城市现代化进行全方位的总结与系统的理论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主要撷取 20 世纪上半叶为考察与研究的层面，主要研究华侨成为推动 20 世纪上半叶广州城市近代化发展的主要原因，继而对这一时期广州城市近代化的各个领域，诸如，市政体制的变化与市政建设的开展、城市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城市新型教育文化设施的增加、城市社会的演变等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 20 世纪上半叶是近代广州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发展为以后乃至当今广州城市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广东省海外移民概况	1
一、早期的海外移民	1
二、契约华工	7
三、近代发展状况	12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	21
第二章 二十世纪上半叶广州海外移民促进广州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24
一、广东侨乡因素的影响	26
二、发展期华侨投资企业概观	28
三、广东及广州地方政府政策的影响	29
四、广州的客观优势因素	33
五、世界局势变化的影响	41
六、中华传统文化、岭南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影响	43
第三章 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工业发展的贡献	46
一、民国以前广州工业的状况	46
二、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投资广州工业的表现	48



三、华人华侨投资广州工业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51
第四章 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商业发展的贡献	61
一、民国前广州商业的状况	61
二、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投资广州商业的表现	67
三、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投资广州商业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69
第五章 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金融业发展的贡献	75
一、民国前广州金融业的状况	75
二、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投资广州金融业的表现	77
三、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投资广州金融业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80
第六章 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城市建设的贡献	86
一、民国以前广州城市布局情况	86
二、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城市规划和布局的贡献	88
三、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投资广州城市规划的特点	102
四、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服务业的贡献	105
第七章 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的贡献	122
一、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城市交通与运输的贡献	124
二、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投资城市交通与运输的特点	138
三、民国时期华侨华人投资交通业对广州城市近代化的促进	141
第八章 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公用事业的贡献	147
一、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建筑业的贡献	147
二、民国时期华侨华人对广州房地产业的贡献	152
三、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邮电业的影响	155
四、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投资广州其他公用事业的贡献	163

五、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投资广州其他公用事业的特点	166
第九章 民国时期华人华侨对广州教育事业的贡献	170
一、清末至民国时期广州教育	172
二、民国时期广州教育	174
三、民国时期华侨华人对广州教育事业的贡献	180
四、华侨华人捐助广州教育的局限及启示	194
附录一 华侨华人研究参考文献	197
附录二 广州城市研究参考文献	204

第一章 广东省海外移民概况

据 20 世纪 80 年代的估算，海外华侨华人有 3000 万人，遍布世界各国。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约占华侨华人总人数的 2/3，即 2000 万人左右。

广东人移居海外由来已久。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国内原因和国际原因，有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而广东地濒南海，海上交往便捷，也利于广东人移居海外。

最初广东人移居国外规模较小，主要移居邻近的东南亚国家。19 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打破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以后，广东向海外移民逐渐形成高潮，不仅移往东南亚各地，而且涌向世界各大州。移民以青壮年男性劳动者为主，大部分为亲友招引；或自费出国的自由移民，部分是被拐骗出国的契约劳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世界性的华侨华人再迁移，一部分原居于东南亚地区和非洲地区的广东籍华侨华人迁移到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由于侨居地的限制和国内变革等原因广东向外移民基本停止。1950 年以后，一些侨眷因继承遗产或需与海外亲人团聚而迁往北美、欧洲等地区定居，但数量很少。70 年代末以后，中国调整了对公民出入境管理的政策，移民人数渐增，除持有上述理由移民外，还有通过涉外婚姻、自费留学等途径出国的，每年平均 2 万余人。

一、早期的海外移民

广东人民移居海外，见于史料记载的，始于晚唐。唐僖宗乾符六年（879 年），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社会动乱，一批广东人逃避海外。阿拉伯旅行家马素提在 943 年途经苏门答腊岛时，即看到许多华人在旧港（即巨港）一带从事耕



植。据说他们是在唐代末年为逃避“黄巢之乱”从广州迁来的。^①

唐代到宋代，中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广州已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宋船已能承担远洋航运的重任，由广州或其他口岸直达东南亚和西亚国家。一些广东人因航运和商务需要而定居海外。宋代人的《萍洲可谈》记载他在广州的见闻，有“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广人举债息一倍，约舶过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的记述，说明当时已有广东人在外国定居十年不返的。另据《宋会要》记述，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左右，“入蕃海商……或名为住冬，留在彼国数年不回，有二十年者，取（娶）妻养子”。所记与《萍洲可谈》吻合。这些数年以至二十年不回，在当地娶妻养子的宋代海商，当包括广东商人。

宋代末年，广东是宋朝抵抗元军的最后据点，部分抗元失败的广东人民和逃避战乱的广东人，纷纷携眷逃往海外。据元代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记述，宋末元初时已有一定数量的“唐人”（中国人）定居真腊。这些中国人包括逃避战乱的广东人。

元代末年，中国国内战乱频仍，又有大批广东人移居东南亚各国。

以旧港为政治中心的三佛齐国，是早期广东籍移民聚居的地区，据《明史》记载，当爪哇国破三佛齐时（1377年），三佛齐“国中大乱，爪哇亦不能尽有其地，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有梁道明者，广州南海县人，久居其国。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此外，旧港地区还有一个以广东人陈祖义为首的华人移民集团。据《瀛涯胜览》记载：“昔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全家逃于此，充为头目，甚是豪横。”两个华人移民集团互不统属，明永乐四年（1406年），梁道明、陈祖义各遣子侄至明廷朝觐。^② 永乐五年，陈祖义却因“潜谋要劫”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被郑和擒回中国处斩，其同党5000余人被明军诛杀。^③ 同年，广东人施进卿成为旧港华人移民的首领。此后，施进卿及其子女管理旧港达数十年之久。可见，14世纪后半期至15世纪初期，旧港

①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出版，第36页。

② 《明实录·成祖实录》卷四四，永乐四年七月丙辰条。

③ 《明实录·成祖实录》卷五二，永乐五年九月壬子条。

地区华人已有数千人或近万人，均由广东人任首领。

暹罗国（今泰国）也是元末明初广东人的移居地。广东、福建移民在暹罗对外贸易中十分活跃，被暹罗王室委任为外贸船主或贸易使臣，同中国、朝鲜、日本开展官方贸易。明洪武五年（1372年）来中国的暹罗使团通事（翻译）李清，洪武六年的暹罗副使陈举成，洪武十二年的暹罗使臣文智利，洪武十四年的暹罗使臣陈子仁，洪武十六年的暹罗使臣奈葛观，明永乐三年（1405年）的暹罗使臣曾寿贤，永乐七年的暹罗使臣坤文琨，^①都是元末明初移居暹罗的华人。另据朝鲜《李朝实录》记录，1393年到朝鲜贸易的暹罗使臣张思道，1394年的暹罗正使张思道、副使陈彦祥，1397年的暹罗使臣林得章，也是移居暹罗的华人。陈彦祥还在1406年任爪哇正使到朝鲜贸易。在明代，东南亚国家几乎都同中国保持官方贸易关系，而且有不少华人移民被各国任命为贸易使臣或通事，其中，以暹罗同中国的关系最密切，华人出任使臣的次数最多。据统计，明朝统治的277年（1368—1644年）间，暹罗向中国遣使112次，比较集中在洪武、永乐两朝，洪武三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370—1424年）的55年内，暹罗遣使中国62次，平均每年1次多。历次暹罗使团几乎都有华人或改易泰名的华人任正、副使或通事。他们多数是福建籍或广东籍华人。由于暹罗使团限定从广州入境，使船和随同来华的贸易船都乐于雇用大批广东籍华侨充任船员、水手或购销人员。他们在发展中暹贸易的过程中巩固了在暹罗的社会地位，为广东人更多移居暹罗奠定了社会基础。

明代初期厉行海禁政策，严禁人民私自出海，不准移居海外的华侨重返祖国。海禁政策迫使海外华侨定居外国，在当地成家立业，成为长期定居和世代定居外国的侨民，并在海外形成华侨社会，海禁政策对中国移民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却不能阻止中国人移居海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的商人和农民，因地少人多，往往不顾海禁法令，偷越海域，到东南亚各国经商和谋生。据《明实录》记载，明正统九年（1444年），“广东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

^①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七十一，洪武五年正月壬戌条；卷八六，洪武六年十二月乙丑条；卷一二六，洪武十二年十月乙酉条；卷一三五，洪武十四年二月丙寅条；卷一六四，洪武十七年八月乙卯条。《明实录·成祖实录》卷三六，永乐三年七月丙午条；卷六六，永乐七年十月乙亥条。